

元史 金史 辽史 宋史 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 新唐书 旧唐书 北史 南史 隋书 周书 北齐书 魏书 陈书 梁书 南齐书 明史 元史 金史

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

精华

汉书（一）

主编 廖盖隆



吉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读《汉书》

《汉书》是毛泽东生前十分喜爱的一部书，可谓爱不释手，甚至连外出视察时都带在身边。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作了大量的批注，并且注重借古喻今，古为今用。

文帝、景帝只是守成

据《汉书》卷九《元帝纪》记载：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惲、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常待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元帝刘爽（公元前76年—前33年），在位16年。爱好儒术，任用宦官。统治期间，赋役繁重，西汉开始由盛而衰。毛泽东读《汉书》，对汉元帝很不感兴趣，这除了西汉是从他手上开始衰败以外，对他改变“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任用儒



生很是反感。因此，他很同意《汉书》作者班固在《元帝纪》的“赞”里说的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柔不断，孝宣之业衰焉。”以儒术治国，似乎就是西汉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特别强调：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柔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政，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

几天后，毛泽东在召见吴冷西等人时，又重提他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里回忆：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召胡乔木和他到自己的卧室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吴冷西说，中央正式决定调他到《人民日报》做总编辑，并仍然兼任新华社社长。由于涉及吴冷西去《人民日报》的工作，故毛泽东重提他4月10日同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毛主席说，他在那次长达四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曾归纳了四点建议。……（谈到第四点时）毛主席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毛主席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



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这两次谈话，毛泽东都批评了《人民日报》的工作，说不是政治家办报，是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些评价。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班固的《汉书》，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的评价很高，对汉元帝则不以为然。言下之意，汉元帝以“书生”方式治国，而刘邦、刘彻之类才算得上是政治家的。

10年后，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次小范围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这个话题：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到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趣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这个评论，当是从《后汉书》所记的内容而言，因西汉从高祖到武帝这段时期，建国立基，开疆拓土，文治武功，景象不凡。东汉光武刘秀，乃为“中兴之帝”，经历一番征杀，遂承续汉家基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不喜式微败落而好蓬勃进取的读史兴趣。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项籍传》是班固在《汉书》中写得最有声色的一篇。毛泽东特别喜欢读这篇传记。1949年4月，他曾在他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作中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不朽佳句。

项籍（前232—前202年），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楚汉相争中楚国的统帅。项氏世代为楚将，因封在项（今河南项城东北），故以项为姓氏。项籍气力过人，从小喜学兵法，但不求甚解。

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反秦起义，项梁、项籍杀会稽郡守殷通响应。次年率八千子弟兵渡长江向中原进军。渡漳河后“破釜沉舟”，奋力死战，大破秦军，章邯投降，秦军主力被摧毁。

项籍进军到函谷关（今河南陕县西）。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想乘机刺杀刘邦未成，然后兵进咸阳，杀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火烧阿房宫。项籍分封了十八个王。封刘邦为汉王，管辖汉中。又三分关中，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

项籍分封，引起诸侯割据，混战不止。刘邦乘机还定三秦，项籍又不善于用人，缺乏战略筹谋，兵势由强转弱，结果被刘邦、韩信、彭越、英布等军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穷途末路。项籍几经突围，最后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杀，时年三十一岁。著有《项子兵法》，已



失传。

项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农民大起义中，以暴风骤雨的气势摧毁了强大的秦帝国。当时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已经覆灭了；楚军的主力已经被击破，主将项梁战死；赵国被围困，即将破灭。形势在逆转，秦王朝声势复振，起义进入生死存亡阶段。项羽在这时候成为主帅，完成了陈胜吴广所不能够完成的事业，以他过人的才气，激励士卒，抱着决死的心情，到底击溃了秦军的主力。司马迁也指出了这点，说他“遂将五诸侯灭秦”。灭秦以后，项羽为西楚霸王，刘邦被他封为汉王，随即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楚汉战争，结果项羽败刘邦胜。

项羽的失败，是发人深思的。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楚汉订立的）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

项羽失败原因，特别是毛泽东对其失败原因的看法，我们曾着重叙述了不肯纳谏，不善用人这个方面。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纳谏和用人呢？这便和他主观上的弱点自然有关。在毛泽东看来，崇尚“沽名”，就是项羽主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

项羽率部经过苦战，击败秦军主力，比刘邦后入关，两军发生冲突。可项羽“为人不忍”，为避免负“不义”之名，没有以40万对10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许多学者注释毛泽东：“不可沽名学霸王”诗句者，多以这件事来说明项羽的“沽名”

所在。

毛泽东认为尤不可学的是，应当还有项羽对诡计多端的敌人姑息宽容的缺点。在楚汉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两军在荥阳相持，本来，楚军已经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便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荥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竟同意了。后来，战事几经反复，楚军逐渐失去了优势，“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和约签订后，项羽就解除了戒备，引兵回到了东边，可刘邦却背约出击，打了过来，终于在垓下彻底击败了项羽。1949年4月毛泽东写“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便曾提出划江而治，维持类似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形势的谈判方案。了解这一背景，或许能增进对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含义的理解。

项羽失败了，仍不失为本色男儿、堂堂英雄。毛泽东坚信这点。青年时代，他憧憬过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在延安的时候，他说：项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宁肯自杀，也不投降，很有气节，远比汪精卫、张国焘之类好，是值得学习的。

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同的。但他并不持完全否定态度，觉得这悲剧结局中还多少体现了一些个性风采。毛泽东1948年10月31日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评蒋家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还把项羽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论说：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



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已经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民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1—262）

“下降和调动可以锻炼革命意志”

《汉书》卷六二是《司马迁传》，对于这篇传记，毛泽东也曾反复诵读，并曾对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1944年9月，他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的演讲中说道：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批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的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



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们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



时期，一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16—817 页）

赵充国“很能坚持真理”

赵充国（前 137—前 52），字翁孙，陇西上邦（今甘肃天水西南）人。汉武帝时，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进击匈奴，被匈奴主力军围困，赵充国率领一百多精锐铁骑率领部队冲出重围，身受创伤二十多处，受到汉武帝嘉奖，任为车骑将军长史。汉昭帝时，赵充国征讨氏族与匈奴有功，被授予后将军。汉宣帝时，因与霍光册立宣帝即位，封为营平侯。汉宣帝神爵元年（前 61），居住在青海湖一带的西羌先零部族起兵反汉，年已七十六岁的赵充国自请为将，带兵出征。赵充国经过调查，了解情况，多次上书宣帝，建议采取打击先零羌，招抚焉耆、开羌的战略方针。破先零羌后，留步兵九校沿湟水屯田。结果先零余部离散，西羌诸部归汉。赵充国用兵注重调查研究。他说的“百闻不如一见”，至今仍是至理名言。他坚持真理，不惜冒犯上的罪名，上书“屯田十二便”。具体详细，分析透彻，具有很大的说服力，最后被采纳。赵充国历任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战功显赫，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就生动、详尽的记述了这位西汉著名军事家的一生。

毛泽东在读《赵充国传》时，很注意这个人，许多地方加了



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赵充国再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毛泽东对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划上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并对赵充国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50年代末期，有一次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一起游泳。游罢上岸后，他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此外，毛泽东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不轻易出击。有一次领兵



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骑遭遇。赵充国说：兵马已疲，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走，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结果，大败敌军，等等。对这些记叙，毛泽东都有圈画，很为重视。

王莽注意农民问题

对于王莽这个人物，史学界有众多评说。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载：王莽（公元前45—23），字巨君，西汉元帝外戚，后来成为新朝皇帝。王莽早年孤独贫寒，勤奋节俭，谦虚好学，名声较好。他当官后，仗义疏财，招纳名士，名声超过了父辈。公元前8年，王莽任大司马。哀帝即位，他一度被罢官家居。平帝即位后，王莽官复原职执掌朝政。公元5年，王莽加九锡。平帝死后，他拥立两岁的孺子刘婴，自己居位摄政，称摄皇帝。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王莽附会《周礼》托古改制，他还多次改变币制，造成了社会经济混乱，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社会危机，反而激化了各种矛盾。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新朝被推翻，王莽也被杀死。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其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农民问题》讲课中说：

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曄、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目耳。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27—128页。）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中，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面，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和“关键”，希望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改变社会的现存秩序。他的这段话是为了说明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反复斗争及其失败，是中国社会演变和停滞的原因。在这里，他把王莽看作是农民阶级的代表，而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对王莽的翻案吧。虽然此时毛泽东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后来那样明确和深刻，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



贾谊是“英俊天才”

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这样一封信: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原》、《鵬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据《汉书》记载,贾谊(前200—前168)18岁时,以能诵诗属书称名于世。汉文帝时,被召为博士,皇帝诏下议论问题,年轻的贾谊则对答如流,才华出众。不到一年,被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可为少年得志。由于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遭到当朝保守派权贵们的谤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汉文帝又召他回来,当梁怀王的太傅。后向文帝进《治安策》,即毛泽东所说“南放归来著此”。贾谊终其一生的职务是“太傅”,怀济世旷才,专心去做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可惜不争气的梁怀王刘揖后来骑马坠落而死,弄得贾谊自以为“为傅无状”,在自责中忧郁早亡,死的时候还不满33岁。

天才短命,毛泽东为之动容。在许多次讲话中,说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例如,1958年5月8



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破除迷信”的讲话，一口气讲了几十个年轻有为的例子，其中也谈到贾谊。他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专家。他写了10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在长沙的时候才只有33岁。（见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第1210页—1211页）

读其它文史著作的一些批语中，毛泽东也提到贾谊。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写的批语里，便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是“英俊天才”。

此外，毛泽东专门写了两首以贾谊为题的诗。一首是《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另一首是《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鹰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过秦论》是贾谊影响最大的政论文。贾谊通过对秦削平六国、实现统一而又短促而亡的原因的总结，期望为汉文帝改革政治提供借鉴，其实际影响绝不仅限于西汉一代。《治安策》是贾谊为国为民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办法。西汉王朝历经40年的统治，经济有较大发展，政治也较稳定，贾谊却居安思危，清醒看到实际上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治安策》里说的“痛哭者一”，是指诸侯割据一方，相继发生在企图夺取中央政权的叛乱，进而提出了削小诸侯领地和权力的措施。这应该说是切中当时诸侯坐大的要害。此外，贾谊还指出了匈奴侵扰、抗外不力、世风侈靡、仁义不施等弊端。所提措施，有的放矢；分析时势，有理有据。所以毛泽东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作伴，“不使太子见恶行”。这种教育方法，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年轻一代要成为革命接班人，必须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观点大有不同。所以他认为贾谊的主张“近于迂腐。”

贾谊让毛泽东生“千古同惜”的感慨，说起来就是这样几点。贾谊是历史上罕见的青年政治家，20多岁就成为了皇帝的高级顾问。史载他任博士期间，每当皇帝下诏令交付讨论时，诸老博士欲语不能，独贾谊出类拔萃，尽为之对。其《过秦论》和《吊屈原赋》等还表明他是一个见识深邃的历史学家和文采超拔的文学家。这对一生喜好文史，在晚年特别关注青

年人才(接班人)的毛泽东来说,当然心向往之。故称其“少年倜傥”“才调无伦”。其次,贾谊是居安思危、见微知著和富有远见的改革家。其《治安策》和《论积贮疏》等提出一系列治国方略,如削弱诸侯领地和权力,改造法度礼乐和服色官名,加力抗击匈奴边患,鼓励农耕、积贮粮食以防意外等等,汉武帝也曾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一意创新求变的晚年毛泽东也说其《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故在诗中说其政论抵得过“雄兵百万”,其改革胆识光照华国。第三,贾谊的命运遭际,一如屈原、刘蕡,“艾萧”老臣们反对他的理由是“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正是这些排挤新进的陈词滥调,使得“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对青年一往情深,对改革一意向往,对奸佞一直愤恨的毛泽东,自然痛惜不已。他在诗里还特别点出了才志高节总受猜忌这一古今都难以避免的“人才逻辑”。